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

倪国良 张伟军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沿着特定的理论逻辑展开与前进的,体现出高度的理论逻辑性。政治理性化、制度化与法治化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政治法治逻辑的主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规律、遵循循序渐进的政治发展思路、不断总结建构指导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体系,是中国政治发展理论逻辑的基本特征。未来中国政治的发展,将在既有理论逻辑的指导之下,继续创新前行,最终将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关键词】政治发展;理论逻辑;理论特征

【中图分类号】D668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8]04-0009-008

10.13553/j.cnki.llygg.2018.04.002

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整体性变革,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巨大成就与变革是显而易见的,政治领域的发展则是隐性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与秩序支撑,为人们的精神自由和政治自由提供了制度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是中国发展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探析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理论逻辑,对于理解中国的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也对于未来中国政治改革进步具有重要的启示。本文试图通过阐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探究指导和规范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理论逻辑的主题和结构,从中观角度初步阐明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与规律,并在这种历史的理论逻辑中关照未来

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从表面上观察,是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结合的结果。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开启者,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就具有经验和实用的强烈意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并不仅仅是经济领域改革而言,对政治领域的改革也具有同样的指导价值。如果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的理解仅限于此,那就不能深刻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与关键,至少对中国政治的理解是片面和不完整的。事实上,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政治发展,在实践探索的背后,有一以贯之的理论逻辑在起着规范

作者简介:倪国良(1962-),男(汉),江苏无锡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中国政治与中共党史;张伟军(1987-),男(汉),甘肃通渭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

和指导作用,中国政治的发展是在严格的理论逻辑的规范和约束下实施和进行的。也就是说,中国政治的发展具有严格的理论逻辑性。这种理论逻辑性隐含在中国政治的发展全过程之中,决定着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节奏、阶段和具体的内容,是中国发展型政治秩序稳定的真正奥秘之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理论逻辑性的证明,首先要澄清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是理想化的,主要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治从人为建构的思想理论出发,即从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论出发,在现实中用一种浪漫主义的政治态度推行理论化思想化的政治设想,结果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倒退和社会灾难。在毛泽东去世后,这种浪漫化的政治实践受到质疑直至被官方正式否定,似乎理论的政治最有可能导向不切实际的政治道路。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人们对此心有余悸。因此,人们对政治理论指导政治实践的热情受到限制,也可以说有意回避,转而走向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的虚无主义,如此结果是轻视政治发展的理论指导性。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政治家在政治问题上似乎采取了一种有意回避的态度,以便减少人们在政治上的无休无止的争论而将国家注意力集中于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物质生产水平。“不争论”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政治的主基调,有效排除了来自各方面可能的对经济发展为核心战略的干扰。^[1]但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不能缺少政治的领导,现代化的政治必然需要相应的现代政治理论的指导和规范。

从政治发展需求看,“文化大革命”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思想,在十年实践中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不能带来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自由幸福,实践的结果是国将不国,民不聊生。改革开放本身需要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政治思想作为指导,这是一项紧迫而急需的理论任务。一方面,如果没有新的不同于“文化大革命”政治思想的理论提出,全面否定之后出现

的政治思想真空就会出现,传统旧政治思想势必死灰复燃,将中国拉回老路上去。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新的政治理论的提出,国家政治就会摇摆不定,众说纷纭,就不能应对社会上新出现和从国外传入的政治思潮的调整,各种政治思潮将对既存的政治体系造成破坏性的冲击,现有社会政治秩序将难以维继。另外,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长历史阶段过程,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作为基础,也就必然需要连续性的政治理论作为指导,以保证为改革开放提供稳定的政治基础。

从政治发展主体看,过去四十年中国政治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共产党为改革开放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为改革开放指明方向。^[2]在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历程就是在理论指导下实践奋斗中取得的。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都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这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政党是完全不同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将理论自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自觉地通过创立新的政治理论,不断地对已有政治理论根据情势变化做出改革和修正,使得自身坚持的政治指导思想符合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并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中国共产党与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理论创新,贯穿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并不断推陈出新,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从政治发展过程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性,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的发展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体系指导取得的,并不是单纯的无方向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国政治在过去四十年的每一点进步,背后都有理论的指导和推动。如此认为,并不是否定经济社会发展对政治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而是强调不应该磨灭政治理论对中国政

治发展的贡献。从人口、民族、领土以及地缘政治等方面而言,中国政治的难度和复杂性是一般小国不能比拟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国,要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其难度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过的。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归于失败,中国改革在全球复杂环境中探索前行。^[3]中国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就,证明了中国政治的成功,从而也证明了中国政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发展。这种发展是有序的,是按照一定的政治理性设计,在有序可控的条件之下进行的,具有自己明显的步骤、阶段划分,在不同的时期阶段有不同的政治改革措施,既从容应对出现的政治挑战,也自主进行政治突破。

从政治发展结果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政治在意识形态、制度建设、法治建设、民主建设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种政治进步并非自然自发的结果,而是中国政治主体经过艰难的不断努力所得来的,期间经过了各种思想的交锋,突破利益集团的阻挠,也经过中国公民的政治抗争,最后形成在全国范围内可复制的推广经验,并通过立法或者其他国家政治渠道上升为国家政治思想、制度的一部分。^[4]也就是说,中国政治的发展是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指导实践,如此实践与理论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普通公民的政治素质和整个政治文化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初步形成了理性成熟的政治文化。正由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性,外界对中国政治的观察和预测也就有了较为可靠的依据,让中国政治变得可预期。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理论逻辑的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理论逻辑的主题,是指中国政治发展指导思想所关注和坚持的核心

问题,是政治政治发展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的问题,这与中国改革开放本身的关注点和核心问题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改革开放以来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论断从宏观总体的角度点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这个论断有大致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本质和目的是坚持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建设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道路的否定,也不寻找走社会主义之外的其他政治道路。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的改革和发展都是为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部改革史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具体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其背后的理论逻辑主题就必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理论、制度、道路的发展和完善,通过独立自主的探索,结合国情和传统,借鉴世界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理论逻辑的主题,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贯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改革发展的全过程,体现在通过有序渐进的政治改革,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理性化、制度化、法治化,最终达到政治现代化的目标。

(一)政治理性化

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是否定和反思“文革”体制与实践。因此,否定和反思“文革”期间的政治体制与政治实践,也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起点。“文革”政治的特点是政治的非理性化,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不断革命为名的社会政治内斗严重,结果是国家政治秩序混乱,政治不以国家良好治理为目标,不能为国家发展提供政治保障。改革开放就是要改变“文革”期间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拨乱反正的重塑,重建理性的政治文

化。在反思“文革”政治的起点上,中国开始了四十年政治改革发展的历程。

政治是公共事务的管理,关乎全体国民的利益和国家发展前途。建立在毫无现实根据的空想基础上的浪漫政治实践是极其危险的,“文革”政治留下的严重创伤让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领导者不得不放弃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实践,转而寻求符合人们普遍要求的,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政治保障的政治思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治理论的第一个转向就是政治指导思想从非理性化走向理性化。政治的理性化从本质上说,就是将悬在空中的政治理想下降到现实的具体社会生活之中,政治并非是神秘的或者精神高尚的东西,而是非常具体的有关现实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和众人利益分配的事务。从形式上摆脱非理性政治中领袖个人崇拜,不再坚持不切实际的政治价值追求,放弃离开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提出虚假的政治口号等。从政治文化上改变政治狂热的不正常政治参与状态,实现常态化社会的常态政治治理,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不过多干预社会自主空间和私人生活,回归政治本来的统治和治理功能,政治与社会适度分离,还社会以自由空间。^[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理性化,是在“要防右”,但主要是“防左”的指导思想下得以实现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左右之争是个常见的问题,“文革”期间的政治一般认为是极左政治思潮的结果,因此,改革开放提出主要防止“左”倾的政治理性化指导思想,其主要内容是政治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政治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政治上层建筑要为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服务,单纯的政治占据一切社会生活空间只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是政治为纲,必须在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循序渐进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无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是有害于国家和人民实际与长远利益的。同

时,政治理性化也为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与保障。

(二)政治制度化

政治的制度化,是指通过制度建构将政治运行纳入规范的轨道,实现政治行为、政治决策的规范化。政治制度化是实现政治理性化、有序化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政治制度建构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国家政治制度在实践中缺乏深厚的政治认同,没有形成稳固的基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便被实质上取消,国家政治迅速陷入非制度化的混乱状态,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政治的非制度化给政治专制提供了机会,各种政治糟粕随之泛起,荒诞不经的政治怪象在中国政治中发生,并长期蔓延发展,造成国家政治文明的严重倒退。

政治的公共性必然蕴含着制度规范的要求,如果公共领域的政治没有制度的规范,必然走向政治无序和倒退。改革开放后国家任务的转变,也需要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为经济建设提供政治保障。因此,加强政治制度建设,实现政治的制度化成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主题之一,也是过去四十年中国政治持续稳定的关键。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导主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高度重视政治制度化建设,将制度建设作为政治稳定的基石。^[6]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迅速恢复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废除的国家主席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多党合作制度以及恢复各级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的机构设置,并恢复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转。通过一系列的恢复举措和制度建设,中国的政治迅速稳定下来,政治秩序迅速恢复正常,国家政治气象为之一新。

国家政治秩序基本恢复之后,邓小平等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政治制度化建设,将政治制度化作为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方式,贯穿于改革开放后政治发展的全过程,不断完善各项政治制度,也

根据形势变化和改革需要改革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制度。加强中国共产党党内制度建设,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在中共十八大后又启动党和国家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和大规模的军事制度改革。经过四十年的不断改革发展,中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已经完全确立,各项具体的政治制度也逐步完善,国家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已经得到有效提高,中国政治走上制度规范的正常轨道。

(三)政治法治化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思维继续主导国家政治进程,国家对法治建设没有足够重视,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结局。改革开放后重构政治制度和重建政治秩序,法律的重要性突显出来,在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法制建设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主题。1982年通过一部适应改革开放需要的宪法,并在之后多次修改完善,对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作了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法律制度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都有了法律依据进行规范,经济立法工作更是突飞猛进,制定了处理国家与特殊地方之间关系的香港、澳门基本法,为国家统一创造了法律途径。改革开放后立法工作的大规模开展为国家政治法治化奠定了法律规范体系的保障,是国家政治法治化的基础。^[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法治化,其内容涵盖了政治运行的各个方面,从制度建构到政治行为,都通过立法进行规范,总体上中国政治进入法治轨道。法治政府建设作为政治法治化的一项重要内容,长期坚持并不断推进,以行政诉讼制度为中心的司法监督逐步完善;政治权力运行的程序化机制受到尊重,法律对政治权力的规范和限制进一步加强;中央与地方关系、政治机构之间关系、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民民主制度在

过去四十年来一直坚持并按规定实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政治法治化避免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政治混乱和无序状态,使得政治权力的运行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为政治理性化、政治制度化提供了基本的宪法法律秩序,也使得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得到有力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法治化主题,是与中国的国家发展目标和国家性质相一致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需要与之相配套的政治制度,东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法治政治是适应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政治制度,法治可以为市场经济提供稳定的规则,界定政府公共权力与市场主体权利之间的边界,为市场主体产权提供有力的保护,也可以为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纠纷提供公平的解决机制。^[8]因此,政治法治化契合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双方互为基础,互相促进。当然,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所推行的法治具有自己的特性,中国法治很大程度上是在工具主义的意义上来理解和运用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与资本主义国家所奉行的三权分立式法治在性质、目的和具体的实施上存在本质的不同。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理论逻辑的特征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蕴涵在中国政治实践之中,为政治发展提供了明晰的理论指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具有自己的显著特征。概括起来,大致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与经济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循序渐进有序推进政治改革与发展的方法;政治理论在继承与创新中不断变革,形成连续的体系化思想理论。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理论逻辑的本质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兼具国家政治重构和为国家整体发展提供制度与秩序的双重任务。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改革事业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对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选择、制度设计和具体落实都有政治决断权。不同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吸收和借鉴不同国家,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合理有效成分,发展和完善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但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政治发展的领导方式是全面多样的,集中体现在对国家政治路线、政治指导思想和政治组织的全面领导上,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创新是围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行的,任何政治发展的理论创新和实践选择都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本质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内在地包含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在思想、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和进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进步带动中国政治的发展进步。

(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规律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理论逻辑的遵循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政治发展要同经济基础相一致,经济是政治发展的条件和基础,政治不能脱离经济而单独存在和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的发展,充分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9]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中心任务转向经济建设,党和国家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也随之发生改变,果断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政治理论,大力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计划经济的瓦解和市场经济的不断确立,使得民主法治建设成为国家政治建设的主要任务,宪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

需要,也随之跟进修改,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法治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在于快速发展变迁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自主空间,客观上需要对国家政治进行限制和规范,改变政治高度集权控制社会的做法。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主空间的增大,也提供了民主法治建设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提供了民主法治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

(三)循序渐进稳健有序推进政治发展的基本方法

政治发展是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进步,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的突变式政治发展模式所引发的不良连锁反应,将会给国家政治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同时,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突变式的政治改革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政情。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路线和发展方式是通过渐进式的改革,有序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中国渐进式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契合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保证了中国政治秩序的稳定。渐进式政治发展模式的核心是具有强大的政治权威的国家党政机构,换言之,党政机构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主导性的地位,人民民主的发展也是在政治权威的领导下存在和扩大的。^[10]渐进式政治发展模式的理论逻辑决定了中国政治发展的速度和限度,民主的扩大以保持政治稳定作为前提,法治为政治发展提供制度框架和良好秩序,渐进式的政治发展也为中国从容推进国家整体发展提供了从容的时空环境。

(四)在继承创新中形成政治发展指导思想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40 年的政治发展,在实践中形成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的系列政治思想,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指导思

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指导思想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治发展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指导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指导思想和政治发展实践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体系内部是继承创新的关系,具有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品格。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的政治思想,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历史任务的回应,也对其后的政治发展指明了进步的方向。^[1]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这种连续性的政治理论继承与创新,保证了中国政治发展的连续性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同时也塑造了今天中国政治的基本格局和未来发展走向。

四、中国政治发展理论逻辑的未来展望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中国政治从革命浪漫的非理性政治转向经验理性政治,从无序政治转向制度化政治,从混乱政治秩序转向法治政治秩序,可以说,中国政治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是,2000 多年的皇权专制政治传统和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某些错误导向,给中国政治现代化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国政治现代化之路面临历史负面遗产的拖拉。同时,中国社会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大转型中,以利益矛盾为主要形式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政治制度不完善引发的政治问题隐形存在,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程度依然不高,这一切都是未来中国政治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的广泛的深层次的变革,主要表现在腐败问题得到重大解决,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突破,依法治国全面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新理念,国家治理理念、制度与方式现代化转型迈出重要步伐。党的十九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思想,包含丰富全面的未来中国政治发展要坚持的思想、路线和方略,全面规划了未来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发展路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理论逻辑的走向、重点与目标。

未来 30 年中国的奋斗目标是实现民族复兴。民族复兴目标包含广泛的内容。其中,从政治发展角度看,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含义有二:一是政治为民族复兴的实现提供制度支撑,保障一个良好稳定的政治环境;二是民族复兴也内在地要求中国政治文明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要遵循民族复兴的大局和大势,在不断的自我变革和创新进步中,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借鉴、继承和创新中走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政治文明发展道路。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出发,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重点在于通过理论和制度创新,解决中国政治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诸如权力腐败、政府不作为、党政军关系以及有效的权力交接机制等。为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价值和保证社会政治稳定,必须重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问题,在协商民主、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基层民主自治等方面不断扩张民主的范围和层次,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疏通社会各主体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进一步构建规范和限制公共权力的制度机制,提高权力运行的认同度与合法性,以此为实现政治稳定有序向前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今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国家治理作为不同于传统的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一种新的政治理念,更多地强调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作,强调政治的公众参与属性,更加重视民主的价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需要不断汲取新的思想观念,不断充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凝聚政治共识,加强顶层设计,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推进政治领

域各项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不断的政治实践中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目标。

〔参考文献〕

- [1]王亚明.关于邓小平的不争论[J].理论探索,2010,(6).
[2]李景治.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3]张树华.苏联政治改革与民主化的教训[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1).
[4]褚松燕.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5).
[5]吕元礼.当代中国政治的实践理性精神[J].深圳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
[6]丁长艳.中国政治体系制度化的逻辑:基础、措施和限度

[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1,(3).

[7]刘金国,陈金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法治化——以政权与治权为视角进行考察[J].法学家,2004,(4).

[8]叶长茂.法治是民主政治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兼论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进路[J].理论导刊,2009,(2).

[9]张奎良.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诉求[J].哲学研究,2012,(10).

[10]关海庭、马胜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特征[J].2016,(6).

[11]包心鉴.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理论指南和锐利思想武器——从邓小平改革思想到习近平改革论述 [J]. 东岳论丛, 2014,(6).

责任编辑:王友平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China's Polit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NI Guo-lian ZHANG Wei-ju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litics sinc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was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 and followed specific theoretical logics, reflecting a high degree of theoretical logic. Political ration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rule of law are the themes of the logic of political rule of law in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cover the following aspects: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basic law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ollowing the ideas of gradual development in politics, and continuously summariz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that guides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will continue to innovate under the guidance of existing theoretical logic, and will eventually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Keywords: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logic;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